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日本研究博士文丛

吉田茂

对华外交思想

(1906 ~ 1972)

Study on Yoshidashigeru's
Diplomatic Thinking toward China

边红彪/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日本研究博士文丛

吉田茂

对华外交思想

(1906~1972)

Study on Yoshidashigeru's
Diplomatic Thinking toward China

边红彪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博士文丛 ·

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 (1906 ~ 1972)

著 者 / 边红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许春山

责任编辑 / 杨传辉 晓 崔

责任校对 / 刘 琳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开

印 张 / 21.6

字 数 / 357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17 - 9/D · 213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 (1906 ~ 1972) / 边红彪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博士文丛)

ISBN 978 - 7 - 80230 - 717 - 9

I. 吉... II. 边... III. 吉田茂 (1878 ~ 1967) - 对华政策 - 思想评论 IV. D831. 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6662 号

本书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

吉田茂外交思想的现代意义

(序言)

边红彪同志经过几年时间的辛勤耕耘，完成了新著《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这本书集中地探讨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基本特点，触及一些有关日本国际战略的问题，为人们理解日本战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不少发人深思的启示。

吉田茂是战后日本最为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战后初期曾经长期担任首相。直至今日为止，他依然是战后以来担任首相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吉田茂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从事日本外交工作，经过长期积累，在战后担任首相执政期间，提出了重经济、轻军备的基本方针，奠定了战后以来日本和平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毋庸置疑，吉田茂外交思想的根本目标是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他能够审时度势，认识世界大势，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在寻求日本发展道路方面，做出了比较明智的选择。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研究的课题。因此，对于吉田茂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吉田茂的外交思想，可以为研究战后日本提供重要的注脚。通过对吉田茂外交思想的认识，人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战后日本发展的基本轮廓，发现日本战后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原因，从而为人们研究战后日本开拓新的思路。

同时，研究吉田茂的外交思想、探讨它的本质，在当前也具有更加明显的现实意义。本书经过认真挖掘，追溯吉田茂外交思

想形成的轨迹，勾勒了它的基本特点。早在吉田茂从事外交活动的初期，他在对华外交问题上提出的主张，就已经显现出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重视经济实利；二是注意审视世界局势，关注那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从一定意义上说，战后吉田茂推行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早期外交思想的延伸，而上述两种倾向则在战后初期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来，并成为影响战后半个世纪日本外交的一些基础因素。

令人深思的是，自从 90 年代以来，一方面吉田茂的“保守本流”思想和他曾经实施的外交政策被渲染为日本战后政治战略最为重要的遗产，而另一方面它的基本原则却又在被逐步淡化。只要看一看近年来日本的政治动向，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吉田茂的主张正在逐渐真正成为历史，新一代的政治家们似乎正在努力摆脱吉田茂留下的框架，推行完全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日本的前景不再像以往的半个世纪那样清晰。

具体说来，吉田茂时代的不少重要命题，或者为人遗忘，或者遭到否定，似乎正在逐渐成为尘封的遗物。试看，日本朝野如今正在紧锣密鼓地试图修改吉田茂时期制定的战后日本宪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军事力量及其运用的条款。近年来，在一部分政治家的推动下，防卫厅已经升格为防卫省，更有一些政治家还要为自卫队“正名”，并且极力鼓吹行使所谓“集团自卫权”。回忆吉田茂曾经回绝美国代表杜勒斯关于日本重新武装的要求，以便实施他关于轻军备和重经济的主张，人们真正感到恍如隔世，似乎他提出的基本方针确实要真正成为埋在历史之中的“遗产”了。

这本著作通过认真的考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今天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从吉田茂在战后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期算起，半个世纪已经过去，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日本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日本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也自然会出现变化。但是尽管时代不同，环境变动，但吉田茂外交思想带给人们的思索却依然发人深省，它具有

明显的合理性，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即使在当代也依然是保障日本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他关于日本发展道路的一些基本设想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边红彪同志认真挖掘和探讨吉田茂的外交思想的这本著作，就更是一份值得人们重视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有关日本的政治思想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年轻和中坚的研究人员出版书籍或者撰写论文，使这个学科不断丰富，而边红彪同志的这一新著无疑又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增添了新的成果。回忆过去数年来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我们深深感到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确实很有必要，十分有助于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也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前进，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高增杰

2007年3月

前 言

吉田茂（1878～1967），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体制的奠基人。战后由于他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的治国方略，确立了对美协调、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家发展基本方向，引导日本从战败中走向了独立与初步的复兴，并以“自由主义的保守本流思想”的持有者以及亲英美派政治家的身份而蜚声于日本政界。在学界一提起吉田茂，人们立刻会联想到他的亲英美外交思想以及自由主义的保守本流思想。正是由于吉田茂路线具有这些鲜明的特征，因此，日本著名学者高坂正尧等将其定位于“顽固的亲英美派政治家”也并不奇怪，这几乎成为吉田茂政治外交路线唯一的“代名词”。

但事实并非如此，战前，吉田茂长期在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中国东北工作，他作为日本外交界的有志之士，在战前长期的外交实践中，始终立足于帝国主义的价值观观察世界，站在“忠君”、维护日本帝国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思考日本的对华政策，他不但继承了幕末以来日本确立的“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观，也继承了对英美协调、结盟，侵略中国的明治外交思想，他坚持结合时代背景以及具体的国际关系的变化，思考和制定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形成了其独特的对华外交哲学思想，从而以战前日本外交界公认的中国通、特别是以维护和推行帝国主义路线下的“重商思想”为核心的吉田茂早期对华外交思想，在日本近代外交历史上留下了他独特的一页。他的这一对华外交哲学思想的形成，为他战后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

思想基础,事实上其早期外交思想与战后外交思想保持了一定的连续性。由于吉田茂早期这一独特的对华外交思想在战前已经形成,从而促使笔者不得不重新审视吉田茂早期外交思想以及其战后对华外交思想中的另外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也正是本书选题追求的方向。

通观日本自西力东渐以来到战败为止近 100 年的对外政策轨迹,可以看到,日本近代外交主要形成了与英美协调、结盟和侵略亚洲国家两条基本的外交路线,支撑这一路线的思想基础,明显是日本幕末以来确立的“军事霸权”国际政治理念以及“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观。可以说除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日本内政外交法西斯化直至战败为止的这一段时期外,日本基本上执行了一条以与英美协调,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为主的对外政策。事实上,这一政策思想的出台,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维新以来日本在如何面对西力东渐、如何确立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运行机制方面,日本的思想家们也有自己的思考,并不断摸索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

幕末,随着西力东渐,日本经历了“开国”与“攘夷”的大争论,整个社会对结束两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体制、摆脱东亚礼治社会的束缚、融入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达成了共识,但在如何把握日本国家的运行机制、如何对待亚洲近邻国家方面,却缺乏成熟的国际政治思想。这时,日本的思想家纷纷献策,对日本的国际战略观以及亚洲国际战略观提出各自的观点。幕末,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从“武力”的角度观察世界,提出了“同力度德、同德量义”^①的国际政治理念,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在双方力量均等的条件下才能论及传统儒学中的“道”、“德”、“义”的价值,在国际政治中只有实力才是决定一切问题

^① 参见高增杰主编《日本对外政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0 年 3 月,第 16 页。

的根本，从这一理念引出的是通过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参与国际角逐的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了“失之西方、取之东方”^①的亚洲政策观，它的思想核心是，日本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与列强平等的地位，就必须“脱亚入欧”，在与英美协调的同时，实施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扩张。吉田松阴的亚洲政策观明显是主张通过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来补偿日本在西方国家遭到的损失。这种“失之西方，补偿于中国、朝鲜”的亚洲政策观的出台，充分说明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日本思想家，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近邻国家中国、朝鲜，更没有将中国等亚洲国家视为抗击西方列强的盟友，而是将它们确定为落后的野蛮国家进行侵略，以谋求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从而说明，日本决心通过增强军事实力、进行武力扩张，并首先通过侵略中国和朝鲜，来实现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可以说，吉田松阴亚洲政策观的出台，为日本确立了亚洲国际战略发展的基本方向。

此后，佐久间象山为日本确立的“军事霸权”的国际政治理念和吉田松阴提出的“补偿式”的亚洲政策观，不但被明治政府继承，而且也被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日本军部官僚所继承，实际上他们成为推动上述政策思想的主要力量。明治维新后，明治维新的实力派政治家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将吉田松阴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亚洲政策观继承下来，成为日本明治政府大陆政策的重要思想来源。日本在明治初年确立的“大力扩军备战，耀国威于海外的方针”以及随后确立的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即是继承上述政策思想的必然归结。

① 木元茂夫：《亚洲侵略的100年》，社会评论社，1994，第12页。1855年俄美签订友好条约后的记录，足以表明吉田松阴的亚洲战略观、中国政策观。他写道：“既与俄、美两国缔结亲善条约，绝不可由我国来破弃，以致失信于夷狄，只应严定章程，厚结信义，在此期间培养国力，迫使容易攻取的朝鲜、满洲、中国服从我国，即从朝鲜、满洲夺取土地，来补偿从俄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他还在《幽囚录》中提出了征服计划，提出要征服北自堪察加、满洲、朝鲜，南至台湾、吕宋的广大地区。

提起“脱亚入欧”，人们还会立即联想到被后人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在福泽的眼里，“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压制落后的，落后的也要被先进的压制”。按照福泽的标准，欧洲显然处于文明阶段，而中国、日本仅处于半开化状态。于是，“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去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基于这一认识，福泽于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强调“我日本国虽然处于西亚之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已经摆脱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有近邻之国，一曰中国，一曰朝鲜，此两国之民皆为亚细亚之政教风俗所熏陶”。而为了寻找出路，“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开明而共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伍而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办法，亦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稍有顾虑，唯有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办法处理之”。^①如果说吉田松阴为日本维新以来的亚洲政策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福泽谕吉则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对这一亚洲政策观进行了理论的升华，福泽“脱亚论”的出台，正是他继承吉田松阴的亚洲政策观、并从理论的高度对其进行升华的具体体现。在福泽对此进行理论定位的基础上，19世纪80年代，日本军部官僚山县有朋又为日本提出了早期的大陆政策，并明确阐述了他的“利益线”和“生命线”思维。1880年11月，山县在上奏文《近邻邦兵备略表》中，倡导军事开道，富国强兵。1890年12月，山县在担任日本首相后，将日本国家的独立与守卫之道以及扩张国力之道明确分为“主权线”与“利益线”两类，^②从而从对外政策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明确定位。此后，日本以“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为主旨的亚洲政

① 《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第239页。

②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第197页。1890年12月6日，山县在《施政方针》演说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策观以及其明确的对外扩张政策，得到了战前日本历届政府的继承，他们的大陆政策观有着一脉相承之特点。无论是大隈内阁的对华“二十一条”、原敬提出的对美协调让步策略以确保日本在华特殊地位的政策，还是田中内阁确立的武力肢解中国的大陆政策，无一不是以对英美协调，侵略中国，贯彻“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为价值取向。可以说，以福泽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对吉田松阴大陆政策观的发展以及以山县为代表的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出台，奠定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明确了与英美协调、向大陆扩张的日本国家的战略路线。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想以及叫嚣对外扩张的军部官僚的思想，与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密切结合，于是，日本武装侵略台湾、朝鲜，吞并琉球，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于1905年以国运为赌注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利权，通过武力扩张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毋庸置疑，日本这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扩张行为，是继承并执行幕末以来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军事霸权”国际政治理念、吉田松阴式的亚洲政策观以及日本早期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实说明，日本在与英美协调、取得了英美列强的支持后，以军事手段发动侵略战争，谋求实现向大陆扩张的目标，希图变中国、朝鲜为它的殖民地，成为实现日本民族独立与富强、实现亚洲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在这背后，支撑日本国家运行机制的思想基础，明显是“军事霸权”的国际政治理念以及“失之列强，取之中国、朝鲜”的亚洲政策观。这表明，日本并不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正义”、“道德”，而是以日本自我生存作为绝对价值和日本国家的行为准则。

日俄战争后，日本立刻在中国东北建立其殖民统治机构，开始了对当地长达近40年的殖民侵略。1915年，大隈内阁乘中国国内发生辛亥革命以及国内形势动荡之际，特别是利用欧美列强忙于大战、瓜分欧洲势力范围而无暇东顾的时机，趁火打劫似的

提出了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这实际上也是实践以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山县有朋为代表的早期大陆政策思想，贯彻“失之列强，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的具体措施。此后的日本历届内阁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例如，一战后，原敬在早期考察欧美国家的基础上，从国家实力的角度认识世界，在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确立的过程中，为日本提出了“对美友好协调”^①的外交政策，从而为日本在新的国际关系确立的过程中确立了协调外交的基本方向，并设定了谋求与新型帝国美国协调、确保日本在中国东北特殊权益的对外政策。原敬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币原发扬光大，华盛顿体制确立后，币原外交在继承原敬对美协调外交思想的基础上，为适应华盛顿体制，提出了以英美为对象的“协调外交路线”，贯彻“对华不干涉外交政策”。^②此外还有吉田茂提出的保持与英美协调，对华实施“强硬外交政策”，以确保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等，都是以继承“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实现侵略中国东北的既定目标为前提的。从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侵略朝鲜、吞并琉球、侵略台湾，到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日俄战争后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再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为止，可以说，日本始终走了一条对英美协调、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不断挑战国际秩序的穷兵黩武的道路，执行了一条与英美协调、侵略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对外政策，这

① 原奎一郎：《原敬日记》第三卷，乾原社，1950，第273页。1908年，原敬在视察美国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将来可谓当系此国。”“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一旦与美国有事，欧洲毫不可恃。因此，因采取多少付出一些代价、务使美国对我之感情有所缓和之方针。”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2，第501页。币原在日本第49届议会的外交演说中，阐明了他的外交原则。即：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外交上贯彻不干涉内政原则。”

正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继承并执行佐久间象山提出的“军事霸权”的国际政治理念，吉田松阴的“失之西方，取之中国、朝鲜”的亚洲政策观的必然结果。

吉田茂战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外交的第一线。他作为日本殖民外交高官，从日俄战争刚结束后的1906年开始，到1928年他出任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为止，先后担任过日本驻中国奉天见习领事、安东领事、青岛总领事、济南总领事、天津总领事、奉天总领事、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等要职，经历了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确立了民族自信、走向民族的强盛，到转而走向战败、又自战后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期间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侵略东北、“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重要事件。因此，有理由说，吉田茂是沿着在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中国驻勤而走过来的。虽然吉田茂在战前未进入日本政治外交的最高决策层，但他仍然以日本驻中国东北领事高官，外务次官，驻意、英大使的身份，具体参与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决策及实践活动，提出了不少独特的思考和见解。他通过大量的外交文书、书信、具体参加外交政策的制定，表达他的思想言论，写下了不少代表他个人思想的文章。例如，在战前最能代表吉田茂的帝国主义价值观的文章，当属他在1928年所写的《对满政策之我见》^①，其主旨是“肯定日本明治大帝所确立的对外扩张路线”，“效仿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变中国为实现日本帝国经济侵略、缓和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殖民地”，这使得吉田茂的思想带有了鲜明的维护和推行日本帝国主义路线、谋求“经济利益”的色彩。

在吉田茂看来，中国大陆的安全与繁荣，对日本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繁荣的中国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了自然市场”。^②按照吉田茂的说法，要确保中国的稳定和繁荣，只有

^① 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吉田茂书简》，中央公论社，1994，第626页。

^② 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264页。

依靠“日、英、美的合作及外来的援助才能实现”^①，并“才会带来真正的繁荣”。吉田茂上述思想的着眼点在于，中国东北是隶属于日本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东北的权益也是日本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取得的“正当权益”。日本推行大陆经营政策、实现“经济优势地位”的前提是安全与秩序，一旦这种安全秩序受到挑战，吉田茂即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干涉，并设法要求日英美共同干涉中国内政，由此表现出了他“遵循法律”和“追求秩序”的思想特征；从而形成了吉田茂以维护和推行帝政路线下的“重商思想”、“遵循法律”和“追求秩序”、与英美协调、实现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特征的早期对华外交哲学思想。

基于这一意义，可以说吉田茂早期对华外交哲学思想，处在日本幕末以来吉田松阴制定的“失之西方、取之中国”的大陆政策观的延长线上。吉田茂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路线的执行人，在毫无批判地继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失之列强，取之中国、朝鲜”的大陆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吉田茂式的对华外交哲学思想及早期对华外交思想，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在日本外交官僚思想上的具体体现。

吉田茂在日本近代政治外交史上留下的所谓独特的思考和见解，是相对于日本具体的对外政策而言的，是他在贯彻和执行上述日本对外政策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外交政策。其主旨是，他早期对华外交哲学思想的形成，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路线，而恰恰是在贯彻这一帝国侵略路线时，与历史时代背景以及具体的国际形势和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策。从而说明，吉田茂没有教条地、僵硬地贯彻执行日本的外交政策，而是在贯彻这一大陆政策观时保持了一定“灵活性”，即显示了他很有“主见”的一个方面。他的这一早期对华外交思

① 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吉田茂书简》，中央公论社，1994，第645页。1937年4月10，吉田茂在写给牧野伸显的信中声称：“中国的繁荣理应缓和日、英等世界各国的通商关系，而且中国的繁荣只有依靠日英美的合作及外来的援助才能实现。”

想的形成，明显地符合了日本的帝国利益，并起到了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作用，因此，吉田茂早期对华外交政策基本上被日本政府采纳，而他本人也成为战前日本外交界公认的中国通、成为战前推行“对华强硬外交政策”的旗手。

从幕末开始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处于随时可能会受到西方列强压迫的危机感之中，因此它在实施“脱亚入欧”战略的同时，将亚洲国家视为落后的野蛮国家进行侵略。在这种国家主义思想的鼓噪下，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很快形成，并确立了采取军事手段、发动侵略战争、向中国和朝鲜等亚洲大陆国家进行扩张的大陆政策。同时，为实现这一扩张政策，日本政府采取了与英美协调的外交策略，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与英美的协调，在其默许和支持下实现向中国朝鲜扩张的目标。因此，日本与英美协调的外交政策，始终是以实现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目标、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吉田茂进入日本外交界的1907年，适逢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并由此确立了民族自信而迅速走向强国之路时。在这一时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①由于日本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获得了巨额利益，并全面向垄断阶段过渡。战争的胜利又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夺取了海外市场，使之成为拥有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辽东半岛的殖民帝国。随着日本以武装侵略为手段的对外扩张路线的形成以及国内垄断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对外资本输出就成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必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很快形成，并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东北渗透，依靠剥削海外国家并建立殖民地来壮大其自身的国力。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1，第90页。

日俄战争后，日本以签订战后媾和条约为契机，作为其对外扩张和垄断资本输出的重要一环，日本迅速提出大陆经营方案，即表明其早已确立了侵略东北的“满蒙经营战略”。随后，日本垄断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东北，其殖民统治机构的建立以及垄断资本的侵入，特别是其设定的首先使中国东北“经济附庸化”、然后在此既成事实上实现东北完全殖民化的满洲经营政策的定位，即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实践。日本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正是用这种方式剥削海外国家和殖民地，以壮大自身的国力。吉田茂早期以维护和推行帝国主义路线下的“重商思想”为核心的对华外交思想，正是在他接受的对外殖民扩张的思想孕育下，在日帝对外扩张势力自我膨胀的时代氛围的强烈刺激下，在日本垄断资本大举侵入中国东北、开展经济侵略的时代氛围中得以很快形成的。他这一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维护和推行日本帝政路线下，谋求建立日本在东北“经济优势地位”思想的价值取向，顺应了日帝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大潮流，表明他毫无批判地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思想，认同日帝对外扩张的国家利益观，是帝国主义思想的代言人和侵略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吉田茂维护日本帝国主义路线、积极参与满洲经营，以实际行动履行了他推行帝国主义路线的思想，并提出了“不急于分割中国领土”、首先确立日本在“满洲”经济优势地位的思想，表现了他与众不同的重商思想。

另一方面，一战后美国的崛起以及新的国际关系的形成和确立，特别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不但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其对外政策，还孕育和促使了吉田茂对华外交政策的转换。他所遵循的维护帝国主义路线下的“重商思想”以及在满蒙问题上的开放姿态，即“与英美协调、引进英美资本”的思想，适应了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因而也符合日帝的殖民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一战后，西方列强重返东亚，提出了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以及民族自决、国际联盟、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等富有极大感召力的口号，吉田茂在“满蒙”问题上的开放姿态以及其